

由“遗民”到“移民”： 高句丽灭亡后入唐高句丽人的身份转变

侯 苗 范恩实

摘 要:探讨了高句丽在总章元年(668)被唐朝攻灭之后,入唐高句丽人身份的转变过程。随着高句丽的覆灭,其原居民成为“遗民”,主要流向唐朝、新罗、渤海、突厥及日本等地,其中流入唐朝的数量最大。唐朝采取了积极的治理措施和安置政策,使得高句丽“遗民”逐渐转化为“移民”。本文通过解析高句丽“遗民”向“移民”身份转化的历史进程,系统考察了其身份嬗变的双重动因:一方面揭示了制度变迁路径对群体身份重构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阐释了文化适应机制在身份转型中的调适功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边疆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过程中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高句丽 移民 遗民 身份转变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434X (2025) 04 - 0014 - 10

总章元年(668),唐朝与新罗联军成功占领平壤城,这一事件标志着高句丽国家的终结。随着高句丽的覆灭,其国民迅速成为高句丽“遗民”。在高句丽国破之后,这些“遗民”主要流向了唐朝、新罗、突厥以及日本等地,根据苗威教授的研究显示“从泉男生投奔唐朝一直到八世纪初,高句丽域内的人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迁移,其中流入唐朝的数量最大”^①,约有107万6千口。因此,本文以入唐的高句丽人为研究对象,与流向其他地区的高句丽人作以区分。

有关高句丽灭亡后其人口流动的相关问题,以往学界也有很多讨论,我国学界已经出现了三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著,分别是姜清波教授所著《入唐三韩人研究》^②、苗威教授所著《高句丽移民研究》^③以及拜根兴教授所著《唐代高句丽百济移民研究》^④。学界除了以专著形式深入探讨这一

作者简介:侯 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东北边疆史、东北民族史;北京,102488。

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东北边疆史、民族史研究;北京,100005。

项目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2023YZD038)。

① 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② 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 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④ 拜根兴:《唐代高句丽百济移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问题外,还涌现了一批专文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学者不仅深入地讨论了具体的“移民”个案^①,还从整体上对高句丽“移民”问题进行讨论^②。此外,学界也出现了以高句丽“遗民”为题^③的相关讨论。不仅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国外学者对相关的问题颇为关注,主要有卢泰敦^④、李文基^⑤、李成制^⑥、金英心^⑦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特别是未能对高句丽灭亡后,入唐高句丽人的身份进行明晰,也没有对其身份转变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关于入唐高句丽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遗民”与“移民”的身份差异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入唐高句丽人在身份上的转变过程,同时分析这种转变的动因及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高句丽国破前的高句丽“移民”活动

虽然唐朝时期,高句丽人的移民活动主要集中于高宗与太宗两朝,但追溯其根源,高句丽人向中原地区的移民历史实则颇为久远。也正是这种长时段的迁居融合,为高句丽国破后,高句丽“遗民”的转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根据史书记载来看,高句丽人首次大规模向内地进行迁徙发生在三国时期,具体是在曹魏政

-
- ① 学界对高句丽“移民”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连勋名:《唐代高丽泉氏墓志史事考述》,《文献》1999年第3期;阎海:《高欢族源探微》,《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1期;赵振华、闵庚三:《高质、高慈父子墓志研究》,《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苗威:《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史事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苗威:《高肇家族的移民及其民族认同》,《民族学刊》2011年第5期;权恩洙:《高句丽移民高钦德·高远望父子墓志铭的检讨与解读》,《大丘史学》2014年第116辑;杜文玉:《高句丽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院学报》2002年第4期;范恩实:《入局唐朝内地高句丽移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冯立君:《高句丽泉氏与唐朝的政治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王连龙、黄志明:《唐代高句丽移民(李仁晦墓志)考论》,《文物季刊》2022年等。
- ② 孙进己、孙泓:《东北亚各国对高句丽土地、人民、文化的继承》,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德山:《高句丽族人口问题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秦升阳:《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拜根兴:《高句丽百济移民关联问题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孙炜冉:《高句丽入唐移民与仕唐翻浆研究现状及其学术价值》,《博物馆研究》2017年第5期;郑好夔、金锦子:《高句丽历史上的移居和移民社群》,《东北亚研究论丛(长师大)》2018年第1期;拜根兴、严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山西历史博物馆论丛》2023年;孙俊:《从羁縻到融入:唐代高句丽移民治理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思考》,《唐史论丛》2023年第2期;王连龙、黄志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移民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等。
- ③ 拜根兴:《高句丽遗民高足西墓志考释》,《碑林集刊》2003年总第9辑;费驰:《对中韩学者关于高句丽遗民问题的比较研究——兼与韩国学者金玄淑商榷“高句丽遗民的自我意识”问题》,《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马一虹:《从唐墓志看入唐高句丽遗民归属意识的变化》,《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拜根兴、侯振兵:《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唐史论丛》2011年第13辑;楼正豪:《新见唐高句丽遗民〈高牟墓志铭〉考释》,《唐史论丛》2014年第1期;苗威:《渤海国的高句丽遗民》,《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范恩实:《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范恩实:《论安东都护府建立后高句丽遗民的两次反叛》,《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等。
- ④ 卢泰敦:《高句丽遗民史研究:以辽东、唐内地及突厥地区的遗民集团为中心》,韩佑勋博士停年纪念史学论丛》1981年。
- ⑤ 李文基:《从墓志看唐高句丽遗民祖先意识的变化》,《大丘史学》2010年第100辑刊。
- ⑥ 李成制:《高句丽百济遗民墓志的出自记录及其蕴含的意义》,《韩国古代史研究》2014年第75辑。
- ⑦ 金英心:《从遗民墓志看高句丽百济的官制》,《韩国古代史研究》2014年第75辑。

权对高句丽进行讨伐之后。景初二年(238),在司马懿讨灭公孙氏政权后,曹魏政权一时间无法对辽东地区实施有效管理,而一直企图扩大势力范围的高句丽却趁此机会出兵辽东。正始三年(242),“袭破辽东西安平县”^①并且多次侵犯辽东地区,试图填补公孙氏政权覆灭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但曹魏政权不愿见到高句丽控制辽东地区,便派出毌丘俭对高句丽进行讨伐。《三国志》中有载:

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官军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九都,屠句骊所都,析获首虏以千数……诸所诛纳入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②

从上述记载来看,这场战争曹魏政权大获全胜,并且将千余高句丽人迁至内地。其中,荥阳是曹魏时期高句丽人的主要迁入地。在进入荥阳地区之后,高句丽人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迅速与当地族群融合。

十六国时期,随着慕容鲜卑诸政权逐渐崭露锋芒,其在东北地区的势力范围不断向外延伸。与此同时,其与高句丽的关系变得愈发错综复杂,而这也导致了十六国时期高句丽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在慕容鲜卑政权初露峥嵘之际,崔攄因早先与慕容廆存有嫌隙,便暗中联合高句丽与段部鲜卑、宇文鲜卑,密谋策划,意图夺取慕容廆的土地削弱其势力。但事情败露被慕容廆发现,崔攄只得“与数十骑弃家奔高句丽”^③。与此同时,慕容廆还对宇文鲜卑和高句丽出兵。其中,“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庞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④明确表明,慕容廆已经将数千高句丽民众迁移至内地。

北朝将领高琳的六世祖高钦也随着这次高句丽民众内迁的浪潮进入内地。从高琳家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展现了高句丽人移居中原后获得极大发展并逐渐融入中原族群的发展序列之中的典型特征。《周书》记载:“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⑤显然,高钦最初是以人质的身份被送往前燕,随后他不仅在前燕安顿下来,还成为慕容廆麾下的官员,留居于前燕进而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钦的影响下,高琳的五世祖高宗带领部众归顺北魏,并官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这进一步促进了高琳家族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高琳作为北魏、西魏及北周时期的杰出将领,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在北魏末年,他参与了对邢杲的征讨,并在对抗南梁名将陈庆之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随后又随尔朱天光击败了万俟丑奴,积累了显赫的战功。进入西魏时期,高琳继续在沙苑之战中立功,击败了高欢并擒获东魏将领莫多娄贷文。他的身影也出现在河桥之战和邙山之战中,并均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进入北周时期,高琳的军事才能进一步得到展现,他随贺兰祥征讨吐谷浑,与豆卢宁一同平定稽胡,镇压了文州氏族的叛乱,并在江陵成功抵御了陈朝将领吴明彻的进攻。高琳的这一系列成就不仅是其个

① [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三国史记》卷17《东川王本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② 《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2页。

③ 《资治通鉴》卷91中宗元皇帝太兴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74页。

④ 《资治通鉴》卷91中宗元皇帝太兴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74页。

⑤ 《周书》卷29《高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95页。

人军事才干的象征,更说明了进入内地之后,高句丽族群已经成为中原政治和军事舞台上不可忽略的力量。此外,高琳的后代也在中原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其子高儒“少以父勋赐爵许昌县公,拜左侍上士。后袭爵犍为郡公,位至仪同大将军。”^①进一步证明了高琳家族在中原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十六国时期,高句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迁移则是在高句丽与后赵结成军事同盟后。由于二者的同盟对前燕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咸康五年(339),前燕决定采取行动,发兵攻打高句丽。面对前燕的攻势,高句丽迅速表示臣服并求盟。然而,前燕为了彻底削弱高句丽的实力,并未就此罢休。咸康八年(公元342),前燕军队分兵两路,直指高句丽的王城。前燕军队在大获全胜后,慕容皝“掘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库累世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②从战争的结果来看,前燕不仅对高句丽进行了沉重打击,还再一次将大量高句丽人带入中原。至后燕慕容盛时期,后燕以高句丽事燕礼慢为由,出兵攻破高句丽新城、南苏等城,又一次“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③。由此可见,在十六国政权时期,大量的高句丽人口因战争进入到内地,成为高句丽“移民”。

在这次迁移浪潮进入中原的高句丽移民典型代表便是高云家族。咸康八年(342)慕容皝将高句丽民众迁徙至辽西的过程中,高云的祖辈便移居至青州一带。在义熙三年(407),冯跋等人“推云为主”^④,而后高云即天王位,成为北燕天王。曾有学者研究认为,冯跋等人推举高云为王是“借高云(慕容云)的特殊身份稳定社会,以争取国内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⑤。

诚然,高云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确实身份特殊。咸康八年(342),前燕军队成功占领丸都山城后,并随后将大批高句丽民众迁徙至辽西地区,高云的祖父高和便是这批被迁徙者中的一员。在此之后,高云家族开始在辽西地区发展,成为诸燕政权的臣子,与这一地区的诸多族群产生了极为广泛的交流。并且到了后燕时期,高云已在朝廷中获得了相当的政治地位。因此,推举高云为王不仅能够有效地赢得辽西各族的支持,还能树立一个吸引周边族群向中原靠拢的典范,从而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实力。

随着北魏势力的日益强盛,越来越多的来自高句丽上层的贵族迁居中原地区并主动与北魏皇族联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高颡家族,高颡家族本身就是从中原迁居高句丽的移民。在高颡四世祖高顾之时,为躲避中原的永嘉之乱而举族迁居高句丽。但随着北魏的兴起,在太和初年时,高颡又与其弟弟高乘信等人重新归顺了北魏。由于高颡实际上出生于高句丽,所以学界在研究过程中多将其视为高句丽人。高颡家族在迁居北魏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其本人被拜为“厉威将军、河间子”^⑥,其女高照容也被孝文帝纳为皇妃,生下北魏宣武帝元恪,并在死后追封为皇后,使高颡家族与北魏皇室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此后,高颡家族在北魏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多人担任

① 《周书》卷29《高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97页。

② 《资治通鉴》卷97显宗成皇帝咸康八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051页。

③ 《晋书》卷124《慕容盛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03页。

④ 《资治通鉴》卷114安皇帝己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599页。

⑤ 金洪培:《冯跋拥立高云为北燕王之原因探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 《北史》卷80《高肇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9页。

高官显职,家族势力日益壮大。

由此可见,北魏作为一个由深度汉化的拓跋鲜卑族群所创立的政权,本身便对周边族群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此外,北魏在其内部推行的一系列宽松政策,更是为那些远道而来的高句丽移民创造了一个安逸富足的生活环境。这些政策不仅使他们得以在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还促进了他们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融入与发展,使高句丽移民在北魏社会中找到了归属感,过上了稳定富足的生活,正如《魏书》所载,高句丽人“家资富厚,僮仆千余”^①。

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大规模内迁高句丽人,《唐会要》记载:“凡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余人。”^②从唐太宗时期迁居内地的高句丽人身位上来看,仍然是既有平民也有上层贵族。《高提昔墓志》记载:

夫人讳提昔,本国内城人也。原夫蝉冕摘华,叠清晖于往躅;潢漪湛态,挺芳烈于兰闾。曾祖伏仁,大相、水镜城道使、辽东城大首领。祖支干,唐易州刺史、长岑县开国伯、上柱国。父文协,宣威将军、右卫高陵府长上折冲都尉、上柱国。^③

可见,高提昔原本为高句丽国内城人,并且其曾祖父出任过大相、水镜城道使、辽东城大首领等职务,说明其原为高句丽上层贵族。而后“其家族是在祖父一代,因唐太宗伐高句丽而入唐”^④,而在其入唐之后,便被唐太宗委以重任并出任要职,其后代也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高句丽国破之前,已有大量的高句丽民众迁居内地,并广泛地生活在中原地区,正如房玄龄所述:“分配诸州,无处不满。”^⑤虽然其在数量上有夸大之嫌,但仍旧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高句丽“移民”在唐朝广泛分布的局面,而这也为高句丽国破后,高句丽“遗民”的流入与转化奠定了基础。

二、高句丽“移民”与高句丽“遗民”辨析

唐朝建立初期,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唐朝采用怀柔的政策对高句丽进行管理,高祖李渊就曾表示,“因而镇抚,允和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氓,于此乎在。”^⑥遂与高句丽恢复了正常的朝贡关系。这种向好发展的朝贡关系一直持续到高句丽宝藏王时期。宝藏王是高句丽的最后一代王,但由于其性格较为软弱,故国家大事均决于盖苏文一人。

贞观十七年(643),唐朝在册封宝藏王的同时,派遣玄奘调停高句丽和新罗之间矛盾,但盖苏文不从。此前,唐太宗已经对盖苏文杀高建武另立新王的行为极度不满,加之在此次调停事件中高句丽已经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太宗随即便表示,“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转

① 《魏书》卷77《高崇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7页。

② (宋)王溥:《唐会要》卷95《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6页。

③ 王其祯,周晓薇:《国内城高氏:最早入唐的高句丽移民——新发现唐上元元年〈泉府君夫人高提昔墓志〉释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④ 范恩实:《入居唐朝内地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安置》,《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

⑤ 《旧唐书》卷66《房玄龄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5页。

⑥ (唐)许敬宗:《文馆词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1页。

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①表达出了唐太宗准备出兵讨伐高句丽的意图。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亲自统率六路大军,自洛阳启程。时至四月,大军“攻盖牟城,破之。”^②转五月,“车架度辽。甲申,上亲率铁骑与李勣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③至九月,太宗因“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④。此后,尽管太宗仍有意再次征讨高句丽,但被朝中重臣以劳民伤财为由极力阻止。因此太宗在统治期间,并未再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唐朝再次对高句丽出兵则是在高宗时期。乾封元年(666)唐高宗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军队东征高句丽至十一月时,“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⑤。至此,活跃在东亚地区近7个世纪、对东亚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高句丽就此成为历史。

尽管高句丽政权已成历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当时高句丽人的身份?笔者认为,针对这一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探讨。首要考虑的是,在高句丽国家覆灭之前就已经迁移到中原地区的高句丽人,泉男生便是这类高句丽人的代表。

泉男生原本为高句丽莫离支盖苏文之子,原本在高句丽国中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因为受到排挤而率众迁至唐朝。乾封元年(666)泉男生因被困平壤城外且次子被杀,故接受其长子泉献诚的建议:向中原投诚。在经过泉男生的两次请求以及泉献诚亲赴求救之后,唐高宗终于向泉男生伸出援手,派遣左骁卫将军契苾何力、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以及营州都督高侃等人前去迎接。

在泉男生成功进入唐朝之后,高宗便以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将军、玄菟公的职务对其进行封赏,表现出对泉男生的高度重视。面对唐朝的如此礼遇,泉男生也给予了厚报。乾封二年(667)泉男生在入朝之后,旋即便返回辽东助阵唐军,加速了唐朝讨伐高句丽的脚步。在战争结束后,泉男生及其家属又继续回到中原生活。从其墓志来看,泉氏家族已然以中原人士自居。

泉男生的墓志所载,“公姓泉讳男生,字符德,辽东郡平壤城人也。”^⑥苗威教授认为此举是墓志的撰写者为规避泉男生“高句丽遗民”的身份^⑦而为之,但笔者认为此点还有待商榷。首先泉男生离世之时距离高句丽灭亡已经过了十余年,并且此间的反叛势力也相继被唐朝镇压,再加上泉男生对唐朝的忠心耿耿,故在编纂墓志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对其出身进行避讳。笔者认为,其墓志中所载“辽东郡平壤城人也”实际上反映了唐朝对朝鲜半岛进行管理的现实。《旧唐书》中记载,“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⑧可见,在攻破高句丽之后,平壤

① 《旧唐书》卷199《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32页。

②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0页。

③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页。

④ 《旧唐书》卷199《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6页。

⑤ 《旧唐书》卷199《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7页。

⑥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67-669页。

⑦ 苗威:《泉男生及其后代移民唐朝述论》,《东北史地》2011年第3期。

⑧ 《旧唐书》卷39《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6页。

城曾一度作为安东都护府之所在。唐上元三年(676)因高句丽遗民的反叛以及新罗的北扩,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迁至辽东郡故城。综上所述,泉男生墓志中对其出身的记述,实为墓志编纂者依据唐朝对半岛的管理现实以及政治需求所进行的文本建构。这种表述既反映了当时唐朝在东亚地区的统治理念,也体现了编纂者对墓主身份与王朝政治合法性之间关联性的刻意强化。同时也反映了墓主人泉男生也具有这样的认知,可见其对唐朝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同。而泉男生的后代对自身的认知变化更加明显。

泉献诚的墓志中便记载其为“君讳献诚,字献诚,其先高句骊国人也”^①。值得注意的是,泉献诚墓志中所载为“其先高句骊国人也”,这与被记载为“其先高句丽人也”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极大的区别。若在墓志中将其记载为“其先高句丽人也”,便是说明在其认知中自身的族属仍是高句丽。但墓志中所载的“其先高句骊国人也”似乎只是客观地记述其祖先的来源的地区,并不反映其对自身身份的认知。

至泉男生的孙辈泉玄隐时,泉氏家族身上的高句丽特性基本消除。在泉玄隐为其子撰的墓志为,“讳毖,字孟坚,京兆万年人也。曾祖特进、卞国襄公男生,祖左卫大将军、卞国庄公献诚,父光禄大夫、卫尉卿、卞国公隐……即开府仪同三司、朝鲜王高藏之外孙,太子詹事太原公王之子壻。”^②可见,泉玄隐在对其祖辈以及高藏的官职以及进行记述的过程中完全采用唐朝名号,说明泉玄隐已经完全站在唐朝视角。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国破后,李勣“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③,包括高藏在内的高句丽上层显贵官僚被悉数迁往内地。在这一过程中,高藏因其特殊的身份而被四处献俘。在高藏以战俘的身份被献于含元殿时,高宗以“政不由己”^④为由对其进行了赦免,并授予其司平太常伯一职。

凤仪二年(677),随着安东都护府的内迁,唐朝又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与泉男生一起被派遣至辽东,对当地的高句丽人进行管理。但此时的高藏仍然没有放弃复国的念头。所以在高藏至辽东之后便暗中“与靺鞨谋反”^⑤,但唐朝及时发现并阻止了高藏的叛乱企图,随后将其流放。从此便可看出,此时的高藏已经在内地生活了近十年,虽然也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其本身仍旧以恢复高句丽为己任,并且以其是高句丽人为认知。故以高藏为代表的在高句丽国破之后仍然以高句丽人自居的群体便是高句丽“遗民”。

高句丽覆灭后,所形成的“遗民”群体在数量与力量上仍颇为可观,并在安东都护府设立后引发了两次重大的反叛事件。其中第二次反叛是由流入新罗的高句丽人所引起的,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而针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反叛,范恩实研究员曾指出,这实际上是“高句丽遗民贵族不甘于接受家族势力沦落而展开的反叛行动。”^⑥笔者是认同这一观点,在其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进

①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6-987页。

②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4页。

③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页。

④ (宋)王溥:《唐会要》卷95《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9页。

⑤ 《新唐书》卷220《高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8页。

⑥ 范恩实:《论安东都护府建立后高句丽移民的两次反叛》,《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9期,第113页。

一步认为,此次叛乱是因为唐朝施行的羁縻政策未能有效推动高句丽“遗民”的转化。

高句丽灭亡之后,唐朝在其故地上新成立了安东都护府以实施管辖。安东都护府初创之际,深受唐朝“以夷制夷”策略的影响,其官员构成采取了“夷汉共治”的模式,并且,众多高句丽人依旧生活在原地。这种状况使得当地的高句丽“遗民”并未发生身份上的转变。对此,唐朝的统治者已有察觉。因此,唐朝在派遣军队进行平叛的同时,再次采取了将当地高句丽“遗民”向内地迁徙的措施,而这一迁徙行动也加速了高句丽“遗民”的转变进程。

三、由高句丽“遗民”到高句丽“移民”

在唐朝平息高句丽“遗民”首次叛乱的过程中,唐朝统治者采取了大规模的内迁行动,将众多高句丽“遗民”迁移至内地。史载,总章二年(669)“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班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出安置。”^①唐朝将大量高句丽人迁徙至内地,不仅稳定了东北边,还进一步促进了高句丽“遗民”向“移民”的转变。

关于总章二年(669)的移民情况,不仅在中原史书中有所记载,在朝鲜半岛史书中也有所提及,在《三国史记》中可见:

夏四月,高宗移三万八千三百户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②

这次迁徙不仅把众多高句丽人迁入中原腹地,实现了他们与中原各族的杂居,而且还为迁居中原的高句丽贵族授予了官职,有力地推动了进入唐朝的高句丽“遗民”的转化。以《高质墓志》中就有记载,“总章二年四月六日,制授明威将军、行右卫翊府左郎将。其年,又加云麾将军、行左武威卫翊府中郎将。”^③唐朝对入唐的高句丽“遗民”授予官职,不仅能推动其快速转型,还能够以他们为榜样吸引、带动更多的高句丽“遗民”实现身份上的转变。这一点可以从高句丽末代王高藏的后代情况进行说明。

高藏虽然在高句丽国破后入唐,并且得到了唐授予的官职,但实际上高藏仍旧以复兴高句丽为己任,所以他仍旧属于高句丽“遗民”。但是这种情况从其子辈时开始发生变化。高藏共有五子,分别为:高福男、高任武、高德男、高连、高德武,虽然史书对这五人的记载不甚了了,但是仍有蛛丝马迹证明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知发生了转变。

据《高震墓志》记载,高震乃高藏之孙,其父高连因功绩卓著,累迁至“云麾将军右豹韬大将军安东都护”^④之职。由此可知,高连并未因其父高藏涉嫌谋反而受波及,反而在唐朝担任了显赫官职。至于高震,其仕途更为辉煌,先后担任过开府仪同三司、工部尚书、特进右金吾卫大将军及安东都护等重要职务,并荣获唐朝赐予的郾国公、上柱国公等爵位。这不仅说明其在唐朝拥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也能间接说明其“遗民”身份的逐渐转变。如果说高藏的子辈身份转变的尚不明显,那么

①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页。

② [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三国史记》卷22《宝藏王本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③ 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④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14页。

其孙辈的转变则更加突出。

史料中可见高藏的孙辈共有两人,分别是高宝元和高震。首先,《新唐书》载“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圣历元年(698),进授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委其统摄安东旧户。”^① 根据上文所述记载,高宝元作为高藏的孙子,在唐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受重用与高度信赖。唐朝不仅赋予了他重任,还允许他重返安东故土,统管昔日的安东百姓,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高宝元对唐朝的耿耿忠心。此外,从唐朝授予其“忠诚国王”的称号来看,不仅是对其个人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效忠唐朝的明确奖赏。

对高震的记载则主要见于《高震墓志》,上文已有提及,可见其崇高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随着高句丽国破,以高藏为首的王室成员被悉数带往唐朝,并逐渐实现身份上的转化,从高句丽“遗民”转变为高句丽“移民”,并最终融入华夏民族的发展序列之中。这一时期,不仅这些曾经的高句丽贵族在进入中原后身份出现了转变,那些被唐朝迁移至中原的高句丽平民也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

在高句丽国破后,唐朝成为高句丽“遗民”的主要流动方向,这一点文本文献多有记载:

《旧唐书》:移高丽户二万入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②

《新唐书》: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提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韩羯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宴者留安东。^③

《资治通鉴》: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叁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④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唐朝在将部分人口纳入军队的同时,更大程度上采取了将他们向内地迁移的策略。就迁移的目的地细分,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西京各州和陇右各州为代表的边疆地域;另一类则是涵盖了长安、洛阳、江淮以南、河南地带、辽西区域以及莱州等传统农业耕作区域。迁徙至边疆地区的高句丽遗民与当地居民共同肩负起保卫唐朝边疆的重任,《旧唐书》记载:“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⑤ 至于那些被迁至农耕区的高句丽民众,在政策上也逐渐与中原民族趋于一致,正如《唐会要》所载:“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⑥。

综上所述,高句丽灭亡之后,部分迁徙至唐朝的高句丽民众确实可以被视为高句丽的“遗民”。然而,随着他们进一步向中原内地迁移,中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这部分为“遗民”的高句丽人在身份上逐渐转变成为高句丽“移民”,并逐渐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发展脉络之中。

① 《旧唐书》卷119《高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8页。

② 《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页。

③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8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二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59页。

⑤ 《旧唐书》卷43《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4页。

⑥ (宋)王溥:《唐会要》卷3《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7页。

结 语

高句丽的覆灭对其民众的身份认同和生活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朝攻克平壤城后,高句丽国民成为“遗民”,并主要流入唐朝。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融合与适应。在高句丽国破之前,已有大量的高句丽移民迁居内地,为后来的遗民转化奠定了基础。唐朝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治理措施和妥善的安置政策,促进了高句丽人在唐朝的融入与发展。

以泉男生家族为代表的高句丽移民,他们虽然经历了高句丽国破,但仍然以中原人士自居,并逐渐融入了唐朝社会。而高句丽的末代君主高藏则成为“遗民”的典型代表,他怀揣着浓厚的故国之思,试图恢复高句丽。然而,通过迁徙移居,高句丽人进入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华夏族群中嵌入式居住,从而促进了其与华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最后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总之,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人的身份转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唐朝政府的积极治理和妥善安置下,高句丽人逐渐实现了从“遗民”到“移民”的身份转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明 阳